**那樣的時代還是不要再來了：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

**文：呂芳雄（2014年五○年代白色恐怖犧牲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遺族致詞）**

**說明：**

如何把對「人」的故事與「時代」聯繫？以下文章可以做為一個示範。呂芳雄先生談及其父呂赫若時，將其父一生經歷、思維、選擇（侷限於客觀條件下的、相對性的選擇），與時代的氣氛、具體社會政治經濟條件，捲在一起。請以本文為參考，「感受」呂芳雄先生的寫作方式，也感受呂赫若（這個人）在時代中的樣貌、精神樣貌。人往往被理解為特殊的，但是時代中的人是有普遍性的，讓各位做「家庭作業」，也不是要強調自己家族史的「特殊」，而是嘗試在「時代（普遍）」中理解人與時代的互動（特殊與普遍的辯證）。最後，本為雖唯一示範，但請勿全然抄襲呂先生寫作的方式（或順序等），請以你自己的方式表達。

**正文：**

各位女士、先生：

我是呂芳雄。今天，主辦單位請我到五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受難者追思慰靈大會現場，向大家說幾句話。我的心情毋寧是複雜而難以言喻的。我的父親，呂赫若，在官方文件裡的記載是這麼幾個字：「呂石堆，ＸＸ歲，台北歌手。」

我的祖籍來自廣東省饒平縣，何時遷居來台已不可考，原來世居桃園龍潭，到了我曾祖父時，舉家遷移到台中潭子的栗林村定居。父親呂石堆出生於1914年8月，是祖父的第三個子女。當時家族的景況算是不錯，在潭子地方上已是具有聲望的大戶人家，也是家族的興盛時期。

1922年，父親開始了殖民地的學校教育，進入潭子公學校就讀。14歲時，父親公學校畢業，隔年同時考上台中一中與台中師範學校。當時考上師範學校的，在潭子鄉只有父親一人，在豐原鎮則有兩位，其中一位是後來也在白色恐怖的肅殺中受難、坐了25年牢的江漢津先生。父親最後則是因為祖父的意願，而進入了免學費的台中師範學校就讀。

1930年，父親就讀師範學校三年級時，我的祖母陳萬里因病去世，父親哀痛不已，從他在這之後的作品裏頭，可以見到十七歲喪母的相關描述。而就在這個時期，父親所遭遇的幾件事，可以說明他早年思想形成與轉變的過程。這時候的父親，時常到台中市政府對面的「柵邊」書店閱讀《中央公論》、《改造》、《資本主義的詭計》、《貧乏物語》等書刊。在台中師範學校時期，他在課業以及音樂成績上表現優異，唯獨在校操行成績，一直是乙等。

父親在20歲時升讀演習科，這時期他經常去找住在社口的堂姊夫林寶煙話家常。林寶煙先生是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在當時他是「赤色救援會」豐原地方班的委員之一，經常在社口地方上的廟口演講，常常因此被日警拘禁。父親的堂姊，也就是林寶煙先生的夫人，曾多次訓斥父親，說自己有一個這樣的丈夫已經受夠了，不想看見自己的弟弟也步上丈夫的後塵。但是父親不為所動，可見當時父親的思想上多少受到林寶煙的影響。

由於操行成績不佳，父親因此被分發到交通不便的新竹娥媚山腳下的娥媚公學校任教，月薪45元，當時五個鴨蛋大約1角錢。娥媚是客家族居住的地方，雖然我的祖藉是廣東饒平縣也是客家族，但是年輕時父親就不會講客家話，在日常生活上有些不方便。同年，父親開始寫作。1935年1月日本文學評論刊登父親的成名作品《牛車》，因受到好評，在台灣文壇上才開始小有名氣。

筆名「赫若」是希望能成為一位赫赫有名的年輕人，1940年3月父親教滿公學校教職六年便離職，到日本學習聲樂，在下八圭祐聲樂研究所及受到著名女聲樂家長板好子教授的個人指導，先後在日本「歐文社」、「東京室塚劇團」等地工作，並隨團在東京「日比谷劇場」、「日本劇場」、「東寶劇場」演出，生活十分忙碌，也十分辛苦。1942年5月因身體健康欠佳，坐最後一班輪船「富士丸」回台。

回到台灣之後，父親展開另一頁文學與音樂的生涯，他加入《台灣文學》擔任「台灣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

1943年11月父親三十歲，參加「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以短篇小說〈財子壽〉獲得第一回「台灣文學賞」，隔年3月小說專集《清秋》由台北清水書店出版，是當時台灣文學界唯一出版的小說集。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文壇二大陣營，有父親加入熱愛台灣本土的《台灣文學》，以及由皇民文學的代表人物、日人西川滿所主持的《文藝台灣》，後者曾經批評父親的作品欠缺「皇民意識」。父親顯然不同意，在日記中記載「希望寫更具有民族性的作品」，為此父親還閱讀浮生六記、桃花扇、紅樓夢、北京好日（京華煙雲）等屬於自己民族的作品。

1945年8月15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了51年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台灣光復，回歸祖國。台灣人民無不歡欣鼓舞，一片喜氣洋洋，展開熱烈慶祝，父親也不例外，正陶醉於興奮歡樂中，並開始改用中文著文。父親在台灣光復後，先後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並且應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邀請擔任音樂老師隨後又擔任北一女音樂老師。

然而，正當台灣省的省民還陶醉在光復歡樂的餘溫中，國民黨政府卻處處顯示出無能腐敗，民眾生活逐漸困苦，開始認清國民政府醜陋的面目。

1946年1月，父親加入當時具有左傾色彩的《人民導報》擔任記者，當時的社長是後來在二二事件中遇難的宋斐如。同年6月在國民黨政府的壓力下，《人民導報》編輯部改組，父親與王添灯等人退出《人民報導》，與蘇新、王白淵等人於台北創辦週刊《自由報》。

1947年2月震驚全台的「二二八事件」爆發，1948年父親擔任《光明報》主編，這時父親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已溢於言表，終於投入地下工作組織，停筆不再寫作，在台北經營「大安印版所」印製地下黨的機關刊物。

1949年5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發佈全省戒嚴令，全省籠罩在一片緊張恐怖的氣氛中，不久保密局逮捕散發地下刊物的《光明報》，身為《光明報》的主編，父親的處境已出現危機，因而結束大安印版所。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年底由大陸撤退來台的蔣介石政權為鞏固台灣作為反共的最後一塊堡壘，對不滿政府的異議份子大肆搜捕，五○年代台灣白色恐怖終於發生，社會上知名人士相繼被捕，已受到有關當局密切注意的父親，便開始潛入地下，在石碇山區從事地下工作時不幸被毒蛇咬傷，而命喪鹿窟。

大約是在母親產前一星期，一個晚飯後的夜晚，父親帶著疲憊的身體，來到舅舅家中，經過一番閒談、小睡片刻後。凌晨天空尚是一片黑暗之際，父親起身離去。臨行時，父親向舅舅拿了一個卡其色的背包，形色匆匆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留下傷心的母親。這是母親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面，從此天人永隔。

父親離開後的一星期，最小的弟弟出生。情治單位後來知道了呂石堆就是呂赫若之後，對錯失一舉逮捕父親的機會感到惋惜，於是把怨氣全出在了舅舅家。在沒有任何文件的情況下，將舅舅和分別在北一女及成功中學就讀的大姊、大哥都一併逮捕，三星期後，才被釋回。

舅舅在保安司令部居留期間，與台大醫院的醫師許強同房，許強醫師後來也犧牲在馬場町刑場。有一次，舅舅好奇地問許強醫師，「您是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是名醫，為何你會加入地下組織？」許醫師回答說，「沒錯，我是醫師，我每天在醫院醫治病，是一種救人的行為，但是在門診中一天能救多少人？我投入地下組織的活動，是設想著要救更多人民的。」

在牢房裡的早餐是很稀的稀飯和一小盤花生米。由於人數眾多，根本不夠食用。在牢房中備受難友尊敬的許強醫師對舅舅說，「你是藥劑師，最會調劑，花生米由你來分配最好。」當舅舅把許醫師應得的、僅有幾顆花生米送到他面前時，許醫師對舅舅說，「將死的人吃不吃這幾粒花生米已經無所謂，而你要走的路還很漫長，要多保重身體。」說完，把花生米送給舅舅。小小幾粒花生米，就可以顯示出許強醫師這樣崇高的人格，舅舅一生念念不忘。

因為父親的事，家族已經多人受牽連。外祖母唯恐父親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會有帶來二次傷害的恐懼，在外祖母的一聲令下，大哥和我就在家中前面荔枝園中挖了坑，把父親所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全部埋掉。埋好以後，還在上面潑了幾桶水。父親的手稿以及未發表的作品從此化為塵土。之後，偶而好奇地向長輩問起父親，長輩們便會用很不高興的口氣斥責，警告我們不許再問，即便在外面也不可以說父親是誰。從此，父親的名字「呂石堆」成為一個禁忌，有了身分證以後，父親欄底下也寫著「行蹤不明」。

父親生前從事文學、音樂、戲劇、教師、編輯、記者等工作，對台灣文化貢獻不遺餘力，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美譽，不幸受到當時白色恐怖傷害，英年早逝，去世的時候只有37歲。在熾熱又亮麗的「才子」光環下，父親走過他的人生，卻留給他的家屬寒冷又黑暗的「冬夜」般的生活。

儘管如此，與父親同行的時代人的道路，最後走到了馬場町刑場的槍口下，我想這個道路，終究還是對的路。只是，為此我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在那樣的內戰、肅殺，親痛仇快的年代裡，有多少破碎的家庭在暗夜裡頭獨自哭泣？今天，在場有許多白色恐怖倖存的受難前輩，他們一樣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也是見證者，相信也和我的父親一樣，所追求的無非是一個平等和平的、民族不再分裂、不再敵對的理想的社會。

到了今天，還是有很多人繼承著這樣的道路，努力的往光明的路走。我想說的、想做的也是這樣。我試著向大家追憶我的父親以及父親的那個年代，我想，如果可以的話，那樣的時代還是不要再來了。